

历史大视野下的
中国共产党90年
90事★

章百家◎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历史大视野下的
中国共产党90年
90事★



章百家◎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46. 七千人大会：全党研究经验教训的一次重要会议 / 337
47. 包产到户：擦肩而过的一次农村改革机会 / 344
48. 中苏关系：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分歧的纠结 / 351
49. 山雨欲来：从“社教”到“四清” / 359
50. 四个现代化：新中国建设中的几曲凯歌 / 370
51. “风雷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再发动 / 377
52. “天下大乱”：从“全面夺权”到“全国山河一片红” / 385
53. “折戟沉沙”：林彪集团的兴起与结局 / 393
54. “解冻”：由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启的外交新格局 / 400
55. 特殊的政治较量：从批极左转向“批林批孔” / 407
56. 一九七五年整顿：邓小平的改革试演 / 414
57. 粉碎“四人帮”：中国政治大转机 / 422
58. 恢复高考：中国教育重新燃起的希望 / 428
59. 真理标准：打破思想桎梏的大讨论 / 434
60. 打开国门：20世纪70年代末的出访潮 / 440
61. 历史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448
62. 实现安定团结的关键：全国性平反冤假错案 / 454
63. 开放的窗口：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 / 464

64. 家庭联产承包制：覆盖全国农村的大变革 / 471
65. 郑重的总结：《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 / 479
66. 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 / 485
67. 走向全方位：中国外交政策的大调整 / 492
68. 成功的探索：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 500
69. 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 508
70. 岩缝奇葩：民营经济的生成轨迹 / 514
71.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摸到了第一块石头 / 521
72. 精兵之路：80年代的两次大裁军 / 529
73. 新老交替：干部制度的变革 / 537
74. 精神文明决议：适应改革的观念变革 / 546
75. 革除弊端：政治体制改革的酝酿与规划 / 554
76. 曲折前行：从价格闯关到治理整顿 / 561
77. 临危受命：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 567
78. 南方谈话：东方风来满眼春 / 573
79. 高举旗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确立 / 581
80. 国企改革：中国改革的攻坚之役 / 588
81. 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 595
82. 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 603
83. 漫长的博弈：从“复关”到“入世” / 611
84. 西部大开发：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 / 618
85.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复兴之路 / 626
86. 中国发展新理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 635
87. 二零零八：应对金融危机 / 641
88. 以人为本：破解13亿人的民生难题 / 648
89. 第三次握手：两岸关系破冰前进的一页 / 655
90. 多难兴邦：同人民在一起 / 665

七千人大会： 全党研究经验教训的一次重要会议

1962年初，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央召开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和林彪发表了基调大相径庭的讲话，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裂痕也由此出现。

一、非同一般程序的大会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所以要召开如此规模的会议，根本原因在于“大跃进”导致的严重后果，经验教训有待总结；当前困难如何克服，也需统一认识；更迫切要解决的是，粮食征购发生了问题。

三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中共中央着急从各省上调粮食供应津、京、沪等大城市，各省因出现农村人口大面积非正常死亡而纷纷叫苦、强调困难。于是，毛泽东提出，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



的大会。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经验都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误，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思想统一起来。于是，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1月11日，大会将如期召开。因准备由刘少奇向大会的报告毛泽东尚未全部看完，故准备安排大会先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和由报告苏共二十二大的问题。但10日毛泽东指示，刘少奇的报告第三部分他不看了，也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先印发到会人员分组讨论，请大家提意见，然后再作修改，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中央向大会的报告事先不经政治局讨论，直接发到大会议论，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非同寻常。在分组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主要是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认为就农村工作而言，是集中过多。鉴于中央认为地方同志严重存在着本位主义，不顾大局，中央很难集中调整、指挥，而地方同志则认为中央集中过多的矛盾，毛泽东提出，报告重新组织起草。大会的主题，也由反对分散主义，转而改为总结经验为主。

二、刘少奇向大会作口头报告

在分组深入讨论中，大家议论最多的问题是：对当前国内形势的估计，出现困难局面的原因，有关错误的表现、错误的性质、错误的责任、错误的原因，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以及对反对分散主义的看法。重新起草报告的21人委员会，也基本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并写入报告。对此书面报告，毛泽东提议不必再在大会上念，由刘少奇另作口头说明。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宣布大会开幕，“请少奇同志做报告”。

刘少奇口头讲话的提纲，是经中央常委定下的。他按书面报告的程序，对书面报告涉及的问题，尤其是与会人员关心的问题，一一进行补充

说明，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时。

首先是对形势的估计。他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预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对产生困难形势的原因，刘少奇引用湖南家乡农民的语言回答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关于“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错误。他说过去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成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不能这样套。他认为，从全国总起来讲，缺点、错误和成绩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的地区，缺点、错误还不止三个指头。

讲到责任，刘少奇说，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

关于“三面红旗”，他肯定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认为对大跃进的解释有一些片面性。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进而断言：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还回避了三个敏感的重大问题：一是“十五年赶超英国”；二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1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稿第二稿时，刘少奇就说，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在书面报告中，《农业



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有讲。特别是四、五、八〔指《纲要》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至于“一大二公”刘少奇表示看不清楚，报告里面也没有提。

三、林彪在大会的即席讲话

1月29日，林彪在大会上作了一个与刘少奇的基调完全不同的讲话。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是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里“烧火”，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但林彪的讲话并未用事先罗瑞卿组织班子为他起草的稿子，而完全是根据他对大会的观察，自己“拉条子”写的提纲。其主要之点，是讲“三面红旗”问题。

他首先以肯定的语气说：我们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后，分析发生困难的原因，他说，两三年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

他认为，大跃进虽然在物质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但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总结犯错误的原因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他强调说，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是，毛主席的思想总是

正确的。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四、毛泽东提议开一个“出气会”

本来在1月27日刘少奇讲话之后，毛泽东随即宣布：大会准备在30日结束，至迟31日结束，从28日到30日，三天的时间，拿出一天到一天半来，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大会上讲一讲，其他时间分组讨论。但在29日林彪讲话以后，毛泽东又提议，让会议延长几天，开一个“出气会”。

会议之所以一转要让人们“出气”，主要是在讨论报告期间，不少与会者，尤其是地委、县委书记们对这几年反右倾、拔白旗、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意见很大，认为这些运动的开展，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动不动给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死官僚主义等等帽子，因此对中央各部及省市县委有相当大的怨气。会上有人说，据中南局统计，中南区在反右派时，党内处理了几万人，反右倾、反瞒产、拔白旗三个运动，共处分32万人。民主革命补课，河南处分23万人，湖南处分2.1万人，至今只平反7万人，不足1/8。

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主题是讲民主集中制。他说：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



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毛泽东还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

为开好“出气会”，毛泽东做了两方面的布置，一方面在大会上强调，要坚决摸省部领导的“老虎屁股”。告诫人们，当“霸王”，是要“别姬”的。另一方面，又让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向各省领导打招呼，检讨不在多，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

由于“出气会”是毛泽东直接布置的，再加上他要亲自听取“出气”情况的汇报，各个省和部委都不敢怠慢。他们一方面发动大家提意见，一方面抓紧准备检讨材料。省委书记们的检讨，是在中央主动承担的情况下，检讨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1960年冬把大饥荒导致人口非正常死亡，认为阶级敌人捣乱，因而在整风整社中，处分了不少县委书记（含县委书记）的干部，伤害了很多人。中央各部的检讨，也纷纷承担了高指标、浮夸风的责任。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年产粮食3400亿斤，当年征购粮食1200亿斤，占1/3强，征购过头粮是造成全国大面积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七千人大会埋下的毛刘分歧

历时27天的大会，虽然未从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大跃进”以来犯的“左”的错误，但还是带来一些新的气氛，这就是可以让人讲话，允许讲不同意见，从而加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政策的调整步伐，也加大了调整力度。对尔后经济的较快恢复，政治空气的相对宽松，文化生活渐趋活跃，都起到正面作用。

然而，大会期间，也使人发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着不同看法，如：对形势的估计，关于缺点错误的严重程度，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人祸”，对“三面红旗”不作肯定的评价，更无积极维护毛泽东的领导言辞，等等。这些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这从刘少奇和林彪在大会讲话

后，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

1月27日，刘少奇讲话结束以后，毛泽东未加任何评论，只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月29日，林彪讲话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这次大会上，其他在大会讲话的人，毛泽东都没有给予评论，唯一称赞的，就是说林彪讲得“很好”。当年参加起草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胡绳事后回忆说：刘少奇在台上讲，毛泽东不断插话，我就担心毛主席是否能够接受。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明确点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讲话中说到：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这些都表明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讲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

(林蕴晖撰稿)

全党研究经验教训
七千人大会：
一次重要会议





包产到户：擦肩而过的一次农村改革机会

农业合作化以后，包产到户的现象屡禁未绝，而每次出现的包产到户苗头，都被冠以“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受到批判。人们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由此被封闭了。

一、包产到户的起落

随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现，如何进行生产管理就成了问题。当时农民们编的顺口溜说：“干部乱派工，庄员磨洋工，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又说：“出工鹭鸶探穴，回家流星赶月，干活李逵叹苦，评分武松打虎。”这说明集体大呼隆地搞生产，损害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因此，各地都在探索把社员劳动与分配劳动成果联系在一起的管理方式，不少地区采取“包工包产”办法，其中多数包到了生产组，四川省江津地区的许多农业社一直包到户。

但第一次真正有领导地搞包产到户，是1956年春在浙江省的永嘉县。时年24岁的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与县委农村工作部干部戴洁天从苏联集体农庄的历史、《人民日报》发表的《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



包产”》的文章中得到启发，明确提出实行“个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做法。在得到温州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同意试验的认可（“试验可以，推广不行”），以及县委书记李桂茂的支持后，永嘉县委常委决定组成工作组，在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1956年9月，工作组将燎原社试点的《包产到户总结》送到县委领导面前。永嘉县委召开千人大会介绍燎原社包产到户成功经验，决定进一步作多点试验。由于永嘉的做法得到浙江省委支持，一时永嘉和邻近的12个县1000多个社约十七八万个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

1957年初，广东省佛山地区一些农业社闹退社，另一些社则实行包产到户。要求包产到户的农民则更多。波及广东、江苏、河南、山西等许多省市。

对包产到户的办法，一开始就有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回到了单干。1957年夏季以后，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包产到户受到严厉批判并被坚决取缔。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戴洁天成了右派和反革命双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举家遣往农村。其他人等，或撤职、或降薪、或劳动教养。200多农民遭批判，20多人被判刑收监，其中一人死于狱中。

过了两年，包产到户又在河南新乡地区信阳县、洛阳地区临汾县一些农村出现。庐山会议反右倾后，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国展开批判。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仍然顽固不化，他们用种种伪装、想种种“理由”，为资产阶级和部分富裕中农反社会主义的私货寻找道路。包产到户再次被压了下去。

二、1961年春再次卷土重来

然而，“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迫使农民们不得不自发地再次搞起包产到户。诚如他们所说：“我们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吃饱饭了，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的脑子想进步，就是肚子太反动了。”于是，出现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责任田、口粮田、借冬闲田等多种形式，人们



称之为“救命田”。实行包产到户的，安徽全省占85.4%；广西柳城县占65.2%、龙胜县42.3%；甘肃省康县、临洮、武威、通渭等县、浙江和四川的局部，十中有七；福建连城和贵州全省，十中有四。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情况大体相同。

安徽省之所以发展得规模如此之大，与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有关。曾希圣与河南的吴芝圃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都曾是“冒尖”人物。1960年，就在吴芝圃为河南出现大规模非正常死亡遮遮掩掩的时候，曾希圣已开始反省。他心情焦虑不安，心存负疚，一直在寻找渡过难关的办法。最初，曾希圣也试图从加强集体生产责任制入手研究对策。1960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曾希圣以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身份，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1月，他赶回安徽，提出实行划小包产单位，这套办法起了一些作用，但仍然没有解决问题。群众说：这是大呼隆变成二呼隆，大锅饭变成二锅饭。1960年12月，曾希圣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到毛泽东说：可以把高级社时期实行田间管理农活包工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他由此受到启发，明确提出恢复农村经济“可以考虑走包产到户的路子”。1961年2月，曾希圣请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调回安徽。在火车上，又听到副省长张祚荫谈下面一个故事：

1960年初，正是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高潮，安徽宿县一个老农，叫刘青兰，73岁，儿子有肺病，别人劝他进敬老院，他向公社要求，不吃公家饭，带着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父子俩开荒16亩，收获3300斤，扣除自用，上交粮食1800斤，现金60元。他汇报了自己的经验，并向有关领导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去种，统一分配，不然不少社员混工，没有责任心，生产搞不好。

老农的事迹和建议使曾希圣很受启发，他称这个老农是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认为“包产到户”是群众的创造，应该推广。

三、毛泽东的最初表态

曾希圣回到合肥，立即召开会议，提出联产到户责任制的设想，这时，“包产到户”仍被视为异端邪说，受到批判。大家感到有风险，需请

示行事。会后，曾希圣亲自向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柯庆施答复说，这个办法可以试验，不要推广。3月7日，曾希圣赴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联产到户责任制的设想，毛泽东表态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毛泽东表态后，曾希圣如释重负。他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于是省委立即向各县委第一书记发出一封信，要求全面推行责任田。

然而，如同1956年一样，不少人认为，这种做法与集体化方向背道而驰。继续以“公”、“大”、“平”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有的认为，这是“单干”，会引起农村两极分化，对孤寡老弱不利，田家英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

广州会议期间，田家英将一份安徽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一封信。他看到材料里反映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到：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他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时候，又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

田家英的担忧同毛泽东是相通的。毛泽东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家英的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

中南局书记陶铸见到田家英说：“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

陈云不以为然。他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该允许人家试验嘛！”

会上，田家英的观点代表了主流。毛泽东让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含义已经与原来有所不同，限制了实验面。曾希圣感到很大压力，不得不于3月20日，打电话回去，通知暂停推行。这时，全省已有39.2%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

四、中央常委出现意见分歧

为澄清人们的误解，曾希圣又给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有些同志有误解，所以再作一些说明。”他说，这种办法好处是改变了计算工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缺点，堵塞了投机取巧、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的政策；提高每个社员对包产的责任心和生产积极性，从而改变了过去对包产只是生产队干部关心或包办，而社员不甚关心或完全处在被动的情况。坏处是：可能发生“各顾各”的危险，有些农活可能会出现争先恐后的现象，自私自利思想可能发展，困难户的困难可能得不到解决等。曾希圣特别强调他们的办法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后来简称为“责任田”），与群众要求的包产到户不同。具体做法是实行“五个统一”。即：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曾希圣想说明这“五统一”将管住农民滑向单干，也想用这“五统一”来抵挡政治风险。目的是想说服毛泽东，希望他进一步支持。可是毛泽东没有表态。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虽然把生产和分配的基层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解决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但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1962年夏，田家英再到湖南调查，出乎意料的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使他转变了原来的看法，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期间，田家英曾到上海向毛泽东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他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6月底，田家英结束湖南调查回到北京，毛泽东还在外地，他随即向刘少奇汇报了情况，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并谈了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表示，可以。

此前，田家英曾将在湖南的调查报告送给陈云，陈云认为田家英提出

的包产到户的意见，“观点鲜明”。随即找姚依林、陈国栋等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他认为，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重新分田的办法，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他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恐怕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

6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他就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先后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等交换看法。刘少奇、林彪都同意。邓小平认为分田到户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周恩来开始说要考虑一下，过一天说耕牛农具等已经合了，不应再散。

7月6日，陈云面见毛泽东，申述了主张分田到户的理由。并认为，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毛泽东听后未表示意见。第二天他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就在毛泽东批评包产到户之后，7月17日，性格耿直的邓子恢又当面向毛泽东陈述了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不是单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五、决策者又一次否定包产到户

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明确表态，是7月8日。他在自己的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毛泽东向大家谈在河南、山东看到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他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7月18日，中共中央紧急下发《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紧接着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7月20日，毛泽东同前来参会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严厉批评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

